

# 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

沈凌<sup>①</sup> 田国强

2009-3-25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考察政治制度的不同集中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民主政治制度也许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赶超发达国家的路径，但集中的政治制度却又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好的”集中政治制度之所以能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与它们具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是密切相关的。在一个陷入“贫困性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只要行政事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太高，一个即使只谋求私利的政府也往往会客观上采取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投资政策。我们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更有利于经济实现长久而稳定的可持续增长。这个研究不仅给中国过去 30 改革开放为什么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也为今后的改革重点和方式提供了某种启示。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治制度。

JEL 分类：D72 H2 O12 P16

##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particular, we show how a dictator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 ca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Our preliminary study tells us: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 is unable to provide a path through wh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dictatorial institutions imply great risks. The good dictatorial regime ca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it needs a stable ruling environment and relative less nature resources. For a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poverty trap’, even a selfish dictatorial government would have incentive to invest in public goods to foster economic growth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institu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D72 H2 O12 P16

---

<sup>①</sup> 沈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ling.shen@mail.shufe.edu.cn](mailto:ling.shen@mail.shufe.edu.cn)。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Email：[gtian@mail.shufe.edu.cn](mailto:gtian@mail.shufe.edu.cn) 联系地址：上海国定路 777 号，邮编 200433。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 年度“和谐式经济增长理论”课题组的资金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奇迹”，也掀开了我国近代以来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理解改革开放的成功及辨明仍然存在的问题，离不开对历史的深刻体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志之士就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振兴中国的途径，其间有过最主要的变革：从洋务运动阶段到民主革命阶段，再到继而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改变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实现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分别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进行对比，来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sup>①</sup>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旗，维持亘古不变的政治体制，重点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洋务运动阶段，国家充当了经济投资的主体，其结果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告终。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近代民主革命则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原有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随后而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历史阶段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激进的变革代价高昂，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就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动乱，经济不可能繁荣，国家就不可能强盛。随后的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政权稳定统一，但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个人行为的经济动因，经济的运行效率越来越低。结果，在一个没有大规模敌人入侵，世界基本安定的环境下，中国痛失了发展先机，到“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几近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在经济制度上，逐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即通过走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来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富民强国目标。这一转变，终于使新中国政治稳定统一这一有利的政治条件，得以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成果。三十年，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非常短促，却是近代以来这170年间最伟大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辉煌。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在这长达三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维持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从未发生过的。由此看来，总结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制度环境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完美结合。从跨度170年的变革图强史来看，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从较长时间来看，都是内生变量。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不是给定制度环境下的产出增长，而是在制度变革和完善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因此，考察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从中国变革图强的历史中寻找客观规律，就变得十分有意义。这也将会是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环境中，民主常常成为重要一环，也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质。因此，长久以来，民主作为一个相对先进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之一。就像我国的民主革命阶段，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撒热血，就是为了结束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对不完善的实现。或者说，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较高的政治集中度。这样的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都有可能，那么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集中政治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有着类似的政治体制，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于造成各个地方最终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轨迹？一句话，民主集中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先行，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却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政治制度的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否必

---

<sup>①</sup> 对中国近代以来变革阶段划分的详细讨论见王一江（2007）。

要？如果必要，应该如何发展？这些都没有获得理论的支持。我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常常是单纯从的政治学角度出发讨论民主的意义，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我们的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是和我们的现有政治制度密切相连的。总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阻力器？我们是不得不将政治体制改革延后，还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作何改变，去适应业已提高的经济水平？

研究这个课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有着非常强的实际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的发展，在地区上是十分不均衡的。东部沿海地区的 GDP 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部分内陆省份，还停留在联合国规定的极不发达水准。那么，总结东部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西部的发展，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着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如果东部的发展是地理沿海的缘故，那么西部就没有复制东部成功的可能。如果东部是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拉动的增长，那么西部要发展就是一个简单的资本投入的过程。如果东部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引入市场机制，完善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上，那么西部要做的首先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具体涉及这个宏大题目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的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并不仅仅包括民主原则。一般来讲，民主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就是多数原则。而现代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原则，还有法治原则，体现保护少数利益的自由主义原则等等。即使在民主原则的制度实现上，现代政体也有很多形式，比如代议制。多数原则也有很多，比如简单多数，三分之二多数，多轮末尾淘汰的奥林匹克多数等等。讨论政治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就需要将各种因素区别开来，分别考虑，而不是将所有制度混为一谈。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为了研究政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本文范围内所讲的政治制度环境，我们采用民主政治最本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集中程度来衡量和刻画政治制度环境。其次，这个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这里只是研究了不同政治集中度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最后，政治制度不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在涉及实证部分往往较难处理。在现有文献中，自 Barro 起，常常引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每年颁布的一个由专家对各国的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考评作为政治集中度的度量，即公民自由指标 (civil liberty index)。一般来讲，集中度高的制度环境给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留下的自由空间较少，因此，这个评价指标就会较高。(它的取值在 1 和 7 之间，越高表示政治集中度越高，或者说民主程度越低。) 本文以下也采用这个指标。

## 一、文献回顾

经典经济增长理论，自 Solow (1956), Cass (1965), Koopmans (1965) 以来，强调的都是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由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致。至于哪些要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则至今未有定论。按照索罗理论，经济水平的差异，是由不同的储蓄率决定的。但是，储蓄率的提高只能带来短期的增长，提高均衡状态下的人均产出，却无法产生一个持久的长期增长率。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在索罗的增长模型之外决定的。

此后，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到索罗模型所不能解释的技术进步上。Lucas (1988) 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而 Aghion et al. (1992) 则继承了熊彼得创新论，强调技术创新，特别是破坏性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这些增长模型里，均衡状态下的增长率是正数了。也就是说，这些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至少部分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但也有不同看法，例如 North and Thomas (1973, p. 2) 指出：“我们在这里列出的（增长的）因素：创新，经济规模，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本身就是增长。” 在他们眼里，一个经济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因为正是制度环境，影响和铸就了经济系统内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激励”（incentive）。

一个经济人为什么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是和他所处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国的房地产，在原有的福利分房制度下，不存在房地产的个人需求（只有对住房的需要，通过指令计划实现），所以投资方也没有动因去加大产出。在取消福利分房之后，对住房的需求迅速形成。于是，资本也迅速向房地产行业聚集，相关的人力资本，创新行为顿如泉涌。从表面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的，但是，这样的投资，难道不是制度的变革所决定的吗？制度因素在最近的经济增长研究中，越来越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特别是，Acemoglu et al. (2004) 更进一步地指出，经济制度是由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所以，现代的经济学家，把探索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的目光，渐渐聚集到政治制度上来了。

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比较少，完整的理论模型就本文作者所知，基本没有。李景鹏（2002）探讨了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似乎民主和促进经济发展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2003）有研究报告探讨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研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以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的，另外一种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似乎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民主制度也不是可以耦合的目标体系。其实该报告提出的后一种政治改革思路，就是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调整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思路。所以它是一个如何改革的问题，并不能回答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而李英田（2004）提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又仅仅做了初步的探讨，而没有完整的理论模型。并且，他更多的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我们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本文不可能对这个宏大课题做全方位的探讨。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首先回答一个相当基本的问题：我们现有的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究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呢？还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选择？即使把问题缩小到这里，我们还是不能做出完整的回答。这里只是试图从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初步涉猎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为以后的研究抛砖引玉。下面第二部分用数据说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民主并不能提供一条赶超发达国家的途径，而集中的政治制度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好的和坏的集中政治制度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第三部分综述先前文献，来解释第二部分的实证结果揭示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好的集中政治制度出现的条件？第四部分介绍我们的理论模型，用来解释集中政治制度对于陷入“贫困性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即使这个集中制的政府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它仍然会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安排。这是前人的研究所没有揭示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 二、现有数据说明了什么？

在西方的经典经济理论里面，自由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民主政治体制的制度环境。西方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把民主政体作为一个暗含的假设，放在经济理论里面，却忽视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不仅仅是 GDP 的提高，还有一个社会政治体制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就不可能在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制度环境假设里面实现。那么在集中和民主之间，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表 1 展示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可能联系。我们从联合国数据库里引用了各国的 GDP。衡量政治制度的集中度的指标来自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公民自由指标 (civil liberty index),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 每年报告一些有关公民自由度, 政治权利, 和经济自由的相关调查结果。这个自由指标, 表示了一个经济体内的经济主体, 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做出自由的经济和政治选择。一般来讲, 一个政治权利集中度很高的国家, 留给经济人的自由度空间就会较小, 所以, 它衡量了政府权力的集中度。这个指标现在被很多经济学家 (比如 Barro) 引用, 作为研究经济发展和民主集中原则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的桥梁。这个指标的范围从 1 到 7。1 代表了集中度最低, 7 代表了最高的集中度。总共有 157 个国家的数据可以找到。在表的第一部分, 我们按照 1970 年的人均 GDP 数据, 选取那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来研究, 总共有 113 个, 其余的为发达国家。这样的分类有助于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些特征。在表的第二部分, 我把这全部的 157 个国家按照这个公民自由指标在 1972 年到 1974 年的平均值 (这样做是为了多保留一些样本, 因为很多国家缺损部分年份的数据) 分成六类。这样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一些联系。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具有相似政治制度的不同国家的增长率的方差, 所以, 可用的数据就很少而不能做回归分析了。所以下表给出的结论都是提示性的, 其准确性有待新的研究。

表 1 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

	样本数 (157)	公民自由度 1972-74	人均 GDP [USD]		70 到 04 年间 的平均年增 长率 [%]	增长率的 方差
			1970	2004		
发展中国家	113	4.56	300	2370	4.78	6.41
发达国家	44	2.81	2446	28550	6.66	4.71
C.L. 7~6	42	6.38	442	2764	4.37	8.03
C.L. 5.9~5	27	5.22	472	4767	4.46	6.28
C.L. 4.9~4	18	4.28	414	3104	4.44	5.49
C.L. 3.9~3	23	3.26	781	6917	6.00	4.32
C.L. 2.9~2	28	2.08	1175	14278	6.07	5.51
C.L. 1.9~1	19	1.02	2733	34977	7.46	0.89
平均值		4.07	881	6418	5.84	6.62

注: 人均 GDP 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局, 公民自由度 Civil Liberty index (C.L.) 来自 Freedom house。指标的定义和解释请看正文。

我们有如下发现:

首先, 发展中国家有着较高的政治集中度。表 1 里面,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制度集中度是 4.56, 而发达国家只有 2.81。其次, 根据该表,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发达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 (6.66%) 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4.78%)。所以, 我们在此看不到所谓的收敛性。相反, 各国收入水平成发散状。更进一步, 我们发现, 政治集中度高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增长率的方差 (6.41), 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方差只有 4.71。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过去三十几年里, 尽管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其增长速度不如发达国家, 但是, 还是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获得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率。

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此看出，政治制度越集中，增长的方差就越大呢？我们可以在表格的第二部分看一看。这里按照政治制度的集中度分类，我们可以较为明确地看到，随着 CL 值的下降（代表集中度的下降），集中度类似的国家越来越有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即一个组别的各国长期增长率的方差越来越小）。在集中度最低的 19 个国家里，三十多年来的平均增长率是 7.46%，而增长率的方差只有 0.89。由此几乎可以得出这 19 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率完全一样的结论。但是，反观集中度相对较大的国家，方差都是相当的大。这说明，政治集中度高的国家的增长率非常发散，没有什么一致性。所以从这个表格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出民主制度比集中制度好的结论（反映在民主程度高的国家的增长率也高），还可以知道民主制度比集中制度来得稳定。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即，集中和民主的不同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

第一，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里，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制度保证。但是从上述表格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赶超的角度来讲，如果民主自由意味着稳定的增长率，那么较早地引入民主自由制度，就会得到一个稳定的和发达国家类似的增长率，也就失去了赶超的机会。但是如果选择相对集中的政治制度，就会冒相当的风险，因为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隐含着悬殊的经济增长率。

第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集中度高，而高的政治集中度又伴随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能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我们能了解什么是“好的”集中的政治制度，什么是“不好的”集中的政治制度，以及他们的存在条件和对经济的影响机制，我们就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关“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的理论。

第三，当通过“好的”集中的政治制度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之后，是否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成果，就要看该国的政治制度能否及时转型，实现较高度度的民主自由原则，从而取得较为稳定的增长率了。在赶超之后时候能够及时实现政治转型，是能否保持稳定而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的关键。

从二战之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也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来讲的好坏）集中政治制度。东亚的经验就是一个典型的“好的”例子。无论是早在二战之前就奠定了发展基础的日本，还是二战之后起飞的“四小龙”，到后来的“四小虎”、中国大陆，集中的政治制度虽然也伴随着一些腐败的不好现象，但是根本上讲，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功是不可抹杀的。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和发达国家拉开距离的大环境下，东亚国家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一个个的脱身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加入富国俱乐部。由于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民族习性和政治制度，所以东亚模式的成功，需要从理论上给予总结，进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提供希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集中的政治制度能在东亚带来良好的经济增长？同一时期，我们也能在世界其他地区观察到“不好的”集中政治制度的例子，比如非洲的民主刚果，该国 1970 年的人均 GDP 还有 350 美元，到了 2004 年，就只有 115 美元了。

### 三、理论上的前期研究：“好的”集中政治制度的条件

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里面，涉猎这一领域的文章不是很多，有代表性的是 McGuire 和 Olson 的思想。他们在 1996 年的文章里指出，政府或执政者的行为选择迥异，并不代表了政府官员的个人品德的好坏。一个政府最后能否贯彻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决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如果一个政府感觉到它的统治相对稳定，那么就有冲动投入较大的资

本到公共物品的建设上去，也就有激励去执行一些有着长远收益的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的政策。而政府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贯彻，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主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建设的保证，正符合了 McGuire 和 Olson 的思想。

政治环境的稳定，可以促进投资。不仅是私人的投资，还包括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希望看到回报的保障，所以，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吸引国外投资，这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早就被实践所证明。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是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会促进政府公共投入的增长。我们这里说的政府投资，是指能够带来实际经济增长的有效的公共物品的投入，而不是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事实上，大量的政绩工程的出现，正是政治环境不稳定的表现。地方政府换届过于频繁，在还是“人治”的条件下，就会促进官员不舍得投入到回报周期长的真正有效益的公共物品投资上去，而是把钱花费到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上，尽管这对长远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贡献。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加大有效的公共物品投入，就需要更进一步稳定地方政府的政治环境，减少过于频繁的换届。即使需要换届，也应该通过合理的考评体系，维护每届政府投资长期有效公共建设的积极性。

除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还有什么能决定政府的行为呢？

在 McGuire and Olson (1996) 基础之上，Shen (2007) 讨论了自然资源和政府行为的关系，以及执政时间内生化之后的情况。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私人投资。私人投资包括了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则是持续增长的动力。当一个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它的私人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时候，政府就有较少的动力继续大量投入到公共物品的建设，或者说，有较少的动力去大量补贴私人投资。而当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的时候，政府就有较大的动力去通过补贴私人投资，加大公共物品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候，集中的政治制度就对经济增长有十分正面的作用了。这个理论模型预测的结果比较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东亚模式，因为东亚的自然资源相对于中东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来讲，的确是算少的。而东亚的集中的政治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有目共睹的成绩。这个理论结果也符合 Ross (2001) 提出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的实证结果。

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也能看到能够体现上述理论的实例。比如，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相对落后的安徽开始的。事实上，当时的地方政府推动（或者说默认）土地承包改革的基本动因，还是为了政局的稳定，为了给人们找饭吃。资源的相对贫乏，使得在既有体制下，私人的投资冲动不足。（原来人民公社下的劳动投入，也可以看作是私人的人力投资）所以，这里的地方政府就有动力扩大公共物品的投入，或者说，补贴私人投资。这里的补贴，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了像承包一样的体制改革。因为土地承包的本质就是减少最终农民收益的上缴比例。或者说是无偿地将原来公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这就像一种投资补贴一样，给农民的私人人力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激励。

浙江的发展，也是一个体现了上述理论的实例。浙江在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里面是中央政府投资的盲点。因为既没有丰富的矿产，又地处前线。中央的投入少，而提取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说，相对其他地区，如东北，西南，上海等，资源十分的缺乏。这里的资源，不仅是指自然资源，还指包括中央投入在内的资本和公共物品投入等，这些不是地方政府能够左右的来自中央的投资，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和自然资源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当地的私人资本投资，也就成为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或者说，是地方政府利益的主要来源。所以，相对上述其他地区，浙江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默默地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样的改革，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私人的投资补贴和公共设施建设。浙江的公

共设施建设好，不仅体现在实物投资上，比如良好的高速公路和通讯线路；还体现在软环境上，比如市场体系的完善，和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软环境，难道不是激励私人资本的重要因素吗？

#### 四、理论上的初探：我们是否需要一个集中的政治制度？

上述前期的研究，是在给定了集中政治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来讨论什么时候集中的政治制度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什么时候它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讨论集中政治制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从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史看，政治制度的确是可以选择的内生变量——集中政治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是值得引入的？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来解释一个集权政府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甚至当它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时也是如此。在这里，政府和私人构成博弈双方。政府人口为 1，私人人口不变，记为  $N > 1$ 。每个私人存活两期，年轻时，他的父辈为他提供教育投资，记为  $b^p$ 。成年期，他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力，获得收入，用于消费  $c^p$  和为下一代的投资。政府不会生产，但是有权力按照税率  $\tau \in (0,1)$  征税。假设税率为常数。政府的收入和私人一样，也被用于消费  $c^g$  和投资  $b^g$ 。政府的投资，可理解为公共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也可以理解为基本设施。总之，它和私人投资一样，能够提高个人产出  $y_t$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是完全替代的，从而产出只取决于人均拥有的资本量。我们假设第  $t$  期个人的生产函数是：

$$y_t = Ak_t^\alpha \quad (1)$$

其中， $A$  是社会的技术水平，独立于个人。 $k_t$  是第  $t$  期的人均资本量，我们假设  $k_t = k_0 + b_{t-1}$  其中  $k_0$  是每个人的基本劳动能力，无需后天的教育也为个人拥有。 $b_{t-1}$  是上一代的总投资，由上所述，它是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共同构成的， $b_{t-1} = b_{t-1}^p + b_{t-1}^g$ 。整个社会的产出是：

$$Y_t = NAK_t^\alpha \quad (2)$$

那么政府的收入就是

$$\tau Y_t = \tau NAK_t^\alpha \quad (3)$$

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他们的效用函数都是：

$$U^i = \beta \ln c^i + (1 - \beta) \ln(\theta + b) \quad i \in \{p, g\}, \quad 0 < \beta < 1, \theta > 0 \quad (4)$$



这个效用函数在两个方面有别于一般的假设，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我们假设了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他们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于私人来说，这很自然，个人的效用取决于他的消费和给下一代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讲，我们这里考虑政府，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样的“圣人”常常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己任，是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假设。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抛弃了这样的假设，退而把政府看成是和私人一样的有物欲的个体。那么这样的政府又何以关怀着给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的下一代的教育水平，代表着下一代的生产力。如果政府可以延续权力（正如我们这里假设的，政府权力不会转移给他人），它会和私人一样关怀下一代政府的收入，而下一代的生产力，则是下一代政府收入的保障，因为我们这里假设了政府没有生产的能力，只能通过征税获得收入。所以，关怀下一代私人的教育投资，实质上就是关怀下一代政府的收入，从而也就关心了国力和国家的强大，进而体现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这和私人对下一代的关怀是一个道理。

第二，我们假设存在一个正的常数  $\theta$ ，其实就是隐含了这样的含义：父辈对下一代的关爱不是无限制的。如果父辈的收入低于一定程度，他将不会给下一代任何投资，而把全部收入都用于自己的消费，这样  $\theta$  可被解释为父辈的最低生存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存在角解  $b = 0$ 。这是符合常理的假设。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贫困人家的孩子常常不能念书，贫困地区的生态恶化常常是由于当地人不顾一切，涸泽而渔的开发方式而造成的。这样的效用函数在类似的经济增长文献中常常出现，比如 Galor et al. (2006)。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遵循简单多数民主原则的政府的情况，作为参照系。在这个简单模型里，因为没有个体的异质性，所以，代表性私人的最优化选择也就是政府的选择。那么该私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begin{aligned} \max_b U &= \beta \ln c + (1 - \beta) \ln(\theta + b) \\ \text{s.t. } y &= c + b \end{aligned}$$

求解得到：

$$\begin{aligned} \frac{dU}{db} &= \frac{\beta}{y-b}(-1) + \frac{1-\beta}{\theta+b} = 0 \\ \Rightarrow b^*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 \leq \frac{\theta\beta}{1-\beta} \\ (1-\beta)y - \theta\beta & \text{if } y > \frac{\theta\beta}{1-\beta} \end{cases} \end{aligned}$$

由此可知，如果该经济体的初始产出值很低（低于  $\frac{\theta\beta}{1-\beta}$ ），那么私人就没有动力进行

投资。如果这一期没有投资，那么下一期的产出和这一期一样，都是  $Ak_0^\alpha$ ，增长率为 0。

这里，经济没有增长的原因就是因为穷，而除了第一期以外的穷又是因为没有经济增长。这样，我们提供了一个“贫困性陷阱”的合理解释。这里我们假设了一个理论上的民主政府，它的目标函数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的有关征税和公共开支的决策完全由简单多数原则决

定，如果条件满足（初始产出值低于  $\frac{\theta\beta}{1-\beta}$ ），所有的私人都会选择不征税。因为征税，再

把税负收入用于公共物品的投资，这与私人投资是完全替代的。既然私人投资对他们来讲不是最优的选择，他们当然也不会赞同公共投资了。

**结论一：**如果存在一个遵循简单多数原则的纯民主政府，在条件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满足时，

该经济体陷入“贫困性陷阱”，增长率为零。

现在我们考虑引入一个拥有集中性政治权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并不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来，它仅仅为了谋求私利。那么，这样一个拥有集中性政治权力的政府会对经济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考虑私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begin{aligned} \max_{b^p} U^p &= \beta \ln c^p + (1-\beta) \ln(\theta + b) \\ \text{s.t.} \quad (1-\tau)y &= c^p + b^p \\ b &= b^p + b^g / N \end{aligned}$$

$$\text{求解得到: } b^{p**}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 \leq \frac{(\theta + b^g / N)\beta}{(1-\beta)(1-\tau)} \\ (1-\beta)(1-\tau)y - (\theta + b^g / N)\beta & \text{if } y > \frac{(\theta + b^g / N)\beta}{(1-\beta)(1-\tau)} \end{cases}$$

不难看出，在引入了一个只谋求私利的政府之后，由于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1-\tau)y < y$ ），而私人又期待政府为下一代投资（ $b^g \geq 0$ ），所以，私人进行投资的收入临界值上升  $\frac{(\theta + b^g / N)\beta}{(1-\beta)(1-\tau)} > \frac{\theta\beta}{1-\beta}$ ，说明他更加不愿意投资了。

**结论二：**在引入一个只谋求私利的政府之后，私人的投资欲望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下面我们考虑政府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begin{aligned} \max_{b^g} U^g &= \beta \ln c^g + (1-\beta) \ln(\theta + b) \\ \text{s.t.} \quad \tau Ny &= c^g + b^g \\ b &= Nb^p + b^g \end{aligned}$$

$$\text{求解得到: } b^{g^{**}}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 \leq \frac{(\theta + Nb^p)\beta}{(1-\beta)\pi N} \\ (1-\beta)\pi Ny - (\theta + Nb^p)\beta & \text{if } y > \frac{(\theta + Nb^p)\beta}{(1-\beta)\pi N} \end{cases}$$

在上面讨论到的“贫困性陷阱”情况下，也就是说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条件下， $b^{p^{**}} = 0$ 。

$$\text{所以, 我们有 } b^{g^{**}} = \begin{cases} 0 & \text{if } y \leq \frac{\theta\beta}{(1-\beta)\pi N} \\ (1-\beta)\pi Ny - \theta\beta & \text{if } y > \frac{\theta\beta}{(1-\beta)\pi N} \end{cases} \text{。这意味着, 只要满足条件}$$

$$\frac{\theta\beta}{(1-\beta)\pi N} < y_0 =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quad b^{g^{**}} = (1-\beta)\pi Ny_0 - \theta\beta > 0 \text{。而 } b^{g^{**}} > 0 \text{ 意味着下一期}$$

的资本  $k > k_0$ ，产出  $y > y_0$ 。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正的经济增长率。由此，该经济体得以跳出“贫困性陷阱”。这是一个只谋求私利的政府实际上做到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好的只谋求私利的政府。我们上面的实证部分讨论的是政府的相对集权。集权往往意味着腐败和低效，尽管并不尽然。有时候集权政府也常常有着崇高的理想，比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本模型给出了一个可能：即使集权政府由于缺乏监督，仅仅为了个人私利而存在，它也会客观上起到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好作用。

**结论三：** 在满足条件  $\frac{\theta\beta}{(1-\beta)\pi N} <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下，一个谋求私利的政府将能够把经济

带出“贫困化陷阱”。它向私人强制性征税，投资在公共物品上，使得经济得以增长。

上述条件并非很难满足。事实上，如果一国的人口  $N$  足够大， $\frac{\theta\beta}{(1-\beta)\pi N}$  往往是很小

的数值。注意，这里的人口  $N$  是相对于政府的人口比例，或者可以理解为官民人口比例。

所以  $\frac{\theta\beta}{(1-\beta)\pi N} < Ak_0^\alpha$  不难成立。而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则是“贫困性陷阱”的条件。所以，不太

严格的讲，在一个陷入“贫困性陷阱”的国家，只要人口足够多，往往需要引入一个只谋私利的政府来带动经济走出“贫困性陷阱”。

如果初始条件不满足  $Ak_0^\alpha \leq \frac{\theta\beta}{1-\beta}$ ，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某个时间突破了这个条件，

那么经济就脱离了“贫困化陷阱”。私人投资转而为正。在这种状态下比较集中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发展了之后的制度选择。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集中型政治制度的代价是政府的消费  $C^g$ 。这个相当于现实生活里面的行政成本和贪

污腐败。如果私人的投资意向增长，那么对于社会的 GDP 增长来讲，政府的税收扣减掉政府消费之后的投资越来越不如私人投资来的有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推出，随着经济的增长，总有一天民主的政治制度会比集中的政治制度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结论在 Schiffbauer and Shen (2009) 的文章中已有讨论。

## 五、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问题，主要在于探讨经济增长的制度保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需要完善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制度环境。我们的实证研究揭示，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所以，本文希望重点说明的就是，这样的集权体制究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阻力器？我们首先用数据说明了，民主带来的不是通向高增长的“赶超之路”，而是一条稳定发展之路。对于希望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或许赶超比稳定来得更加有吸引力。但是，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的不同。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差别很大。作为东亚模式的一员，我们的好政府行为如能得以解释，这将是我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的贡献。

我们首先回顾了有关文献。这类文献尽管不多，但是这些理论还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McGuire and Olson (1996) 解释了稳定统治的必要性，Shen (2007) 谈了自然禀赋对政府行为的作用，以及在政府治理时间内生化情况下的政府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它继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引入了 Galor 有关父辈关爱的有限性的假设，考察了在一个陷入“贫困性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即使只谋求私利的集权国家，也会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投资政策的内在机理。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往往具备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而其经济增长又极不相同的可能解释。从不太严格的角度讲，它也是一个好的集权国家的必要性的解释。

我们的研究从数据方面也得到了印证，相对集中度较低的民主制度往往代表着稳定的增长，同时，它的平均增长率也比集中的政治制度来的高。因此，上面得出的好的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这一结论应该是阶段性的。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见，私人的投资冲动增加，集权型政府的强制投资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它的成本将会凸显。所以，对于增长来讲，及时地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将不仅有利于政治上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从经济上看，也是有利于经济实现长久而稳定的可持续增长。我们的这个研究不仅给中国过去 30 改革开放为什么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也为今后的改革重点和方式提供了某种启示。中央提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其首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也表明了这点。田国强 (2008) 阐述了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民主与法治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经济发展之后的制度选择，还没有被纳入本文的正式框架中。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虽然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但经济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政治制度。所以，我们将来的研究会更进一步，不仅考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政治制度环境，还要考察经济增长将会带来的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构建一个经济增长与政治、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从而真正总结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理论贡献。

## 参考文献:

- 李景鹏 2002.3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滞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李英田 2004.1 “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理论与改革
- 田国强 2008 “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
- 王一江，《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学名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 2003“从经济发展角度冷静地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研究参考 第48期
-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2004)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 Ru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0481
- Aghion, P. and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pp.323-351
- Cass, Davi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 pp.233-240
- Galor, Oded and Moav, Omer** (2006) “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 Demise of the Calss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1), pp. 85-117
- Koopmans, Tjalling C.** (1965)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pp.3-42
- McGuire, M.C. and Olson, M.** (1996) “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pp.72-96
-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L. Michael** (2001)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 pp. 325-361
- Schiffbauer, Marc and Shen, Ling** (2009) “Democracy vs. dictatorship: compar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growth under two political regimes” *forthcoming in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 Shen, ling** (2007) “When will a dictator be good?” *Economic Theory* 31(2), pp. 343-366
-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pp. 65-94.